

# 晚清“新史学”思潮在民国学界的延续和批评

## ——以章焱《中华通史》为中心的考察

何昱杰

(淮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要:**章焱《中华通史》是清末民初编写的带有教科书性质的中国通史,内容采用新式章节体、注重历史分期、突出民众史、强调民族国家观念等,体现了新史学发轫时期史书编撰重通史和民族主义的特征。此书作为晚清“新史学”的最初实践与代表作,一方面曾入选1930年代商务出版的“大学丛书”,在当时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的社会效应,成为更新潮学人批评、遮蔽的标靶,使后世知者寥寥。这个知识传播的过程,透露出今人理解中国史学现代转型时,难免用五四学人的眼光打量,忽视了若干关键环节。

**关键词:**民国学界;晚清“新史学”思潮;章焱;《中华通史》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683(2023)02-0036-09

长久以来,学者们对新史学概念的界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按照桑兵对近代中国新史学流变的总结,新史学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自称、他指和后认。<sup>①</sup>自称是指自我标榜“新史学”的思潮,以梁启超、何炳松的相关著述为代表,又可谓狭义的“新史学”,而广义上指中国一切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在其出现时都可称为“新史学”。本文所论晚清“新史学”,其实是指梁启超所命名,中国史学现代转型之第一阶段的形态。而由梁启超等人开启的晚清“新史学”理念,其最初的实践就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sup>②</sup>期间涌现出像夏曾佑《最新中国教科书中国历史》和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等名作,而依照《民国总书目》统计,民国面世的中国通史著作更达百余种。至于清末已投身这项事业的章焱,编写过如《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及《中国大历史》等共六七部之多的通史教材,且内容完整、

富有学术新意。20世纪20年代,他还主讲北大的中国通史课程,其所著《中华通史》于抗战初期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共同入选商务版“大学丛书”,足见是书价值及形成的社会影响。即便如此,抗战结束后,此位学者却不常被学界提及,今日追述晚清“新史学”时亦未给予足够关注,这多少有失公允。若重新梳理民国学界对晚清“新史学”思潮继承与批判的状况,或能揭示出章焱后世“失语”的缘由,进而思考现代学术谱系形成的曲折复杂之处。

### 一、章焱与新式通史编撰

章焱字厥生,1880年生于浙江仁和(今属杭州),1884年由母亲授读,后主要受私塾和书院教育。综观章焱一生,其执教学术生涯,自1903年乡试中举开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收稿日期:2022-04-18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2022AH050359)

作者简介:何昱杰(1991—),男,安徽合肥人,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讲师,博士。

①参见储著武、汤城:《历史教科书与新史学》,《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刘利娜:《由传统走向现代:论中国史学的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越:《近代新式中国史撰述的开端》,《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刘超:《历史书写与认同建构: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1904—1914)主要在杭州新式学堂任教,这些学堂以师范教育为主,同时应上海文明、中华书局之请,编写新式中小学教科书。1912年章崧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史学教习,发愿并着手《中华通史》撰写,1913年秋辞教习专注通史的编定。<sup>[2]</sup>第二阶段(1914—1924)以1914年《中华通史》的完成为开端,同年他应北京地学会会长张相文之邀,到北京任《地学杂志》笔政。1915年他蒙高师校长陈宝泉拔擢,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系讲师改任教授充国文系主任,因繁忙辞地学会职务。<sup>[3]</sup>1921年章崧兼任北京大学史学系讲师,学术兴趣广泛,其书斋(天行草堂)落成,欲汇平日札记、诗歌、篆刻等编成《天行草堂丛刊》,内中兼有中学和西学。第三阶段(1924—1931)从京返杭,因江浙战争、北伐战争爆发,家庭、国家皆处多事之秋,章崧辗转于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身体健康则每况愈下,虽先后任教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然为期皆短,治学恐心有余而力不足,学术成果较前两期明显减少。1931年章崧病逝杭州,1933年《中华通史》入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出版,其遗稿汇编《天行草堂主人遗稿丛刊》于1935年铅印。<sup>[4]</sup>

章崧的学术成就,除遗稿外主要集中在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20世纪初年,章太炎和梁启超等人都有中国通史的编写意向,夏曾佑、刘师培先行完成。足见,晚清“新史学”思潮在强调进化论、批评古代史学、提倡“民史”之外,蕴含着撰述通史的要求。加上清末以来学制的调整改革和科举的废除,使得以教科书面貌呈现的中国通史著作层出不穷。章崧有感文化风潮,亦为满足新式学堂的教学需要,编写了大量通史著述,清末计有:《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8),《中国大历史》(1910)。1913年则共有四种问世:《中华历史地理大词典》《新编中华历史教科书》《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新制中华历史教科书》(第三学年第一学期)。黄现璠1933年曾指出,1902年至1913年出版的数十种历史教科书中,“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和章崧《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则于“史事方面,皆以帝名标题,题下加以简要叙述,同时书顶眉标,亦颇扼要”;“编制及材料,颇为得当,极合教科书之用。惜民国以后,无人增订”。<sup>[5]</sup>而章崧编纂通史的集大成作《中华通史》,1935年被吴景贤认为是清末民初写“民

史”的代表,即其历史观念由“君史”立场进而转向“民史”立场,这在中国史学史上,可谓是个大过渡,也成为晚清“新史学”思潮在民国变迁的真实写照。<sup>[6]</sup>

## 二、《中华通史》思想内容和体例的特点

清末民初的新式通史教材,在思想方面主要受梁启超、章太炎的影响,而编纂体例多模仿日本教科书。张元济在1902年就劝诫国人“勿沿用洋人课本”,因为它们“大都以阐扬彼教为宗旨,与中学绝无关系”,若要改变此状况,需重新编译图书或修订通儒旧作。<sup>[7]</sup>故以章崧为代表的中国学者,积极吸收、改造日式教科书的编写方法,摒弃其间关于中国历史的偏见。在中华民国成立的时代大变局下,重新确立国人书写本国史的核心立场与方向。应该讲,《中华通史》既有晚清以来“新史学”的一般色彩,也有受新环境推动而产生的个人创见,最终自成体系,这从该书著述立场、叙述线索、内容设置等方面都可见一斑。

### (一)“中华”和“民国”为核心的著述立场

梁启超曾说:“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sup>[8]</sup>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使确立国族认同成为晚清“新史学”的重要目标。历史被赋予了塑造民族国家的任务,作为新史学实践形式,梳理前人事迹,以激扬爱国热情,自然是历史教科书,特别是通史教材编撰的自觉要求。而关键问题在于现代国族的内涵是什么?清末对中国民族的认识,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区别,梁启超主张广义民族主义,合汉、满、回、苗、藏等组成大民族,这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基础。<sup>[9]</sup>章太炎要推翻清廷统治,主要将中国民族狭义理解为汉族。章太炎《中华民国解》中指出:华、夏、汉实为相同意思,“随举一名,互掇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溢”<sup>[10]</sup>。可见,章太炎所描绘的中华民国,基本上是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即“中华民国”由汉族一个民族构成。这种倾向,不单是章太炎的思想,自中国同盟会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用语不难看出,其代表了近代革命派的普遍意见。而章、梁两人的冲突,也反映出戊戌变法失败后,排满革命与预备立宪继起,因政治斗争需要,传统夷夏观念还有相当影响,但君主

立宪、民主共和角力争先,终在复杂历史变局下诞生中华民国。<sup>[11]</sup>

章崧感此事尘埃落定,认为“种族之辨,其将已矣”,故说到:“今者吾人取广义之民族主义,合汉、满、蒙、回、藏五族组合一大民邦,而一切历史上之陈迹,在所勿论,惟道德与政治双方之进化,而始克有所谓五族共和之一日。”章崧相信“遵斯道也,吾五族人民之当为团集,永相结合,以巩我中华民国之基宇,无可疑也”。<sup>[12][14-15]</sup>应该讲,章崧肯定了排满革命于建立中华民国过程里的贡献,却也强调在民国建立后应以“五族共和”为发展的重心,使清末中国民族的广义狭义之争,让位于中央政府管治下,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此处明显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孙中山曾多次宣扬“五族共和”的精神,提出“五族共和,天下一家”,“五族合一,创建共和”,“今日中华民国,南北统一,五族一家”等说法。<sup>[13]</sup>对孙中山等曾倡导民族革命和推翻满清的革命家而言,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可谓是政治路线的极大转变,对章崧来说则是新时代环境下著史立场的重塑。

当然,“中国”“中华”并为中华民国之通称,自是沿承千古旧习,而定义之性质,则富有时代精神,并伴随新政权诞生而最终确立,1914年章崧的论述可作一般性代表。<sup>[14]</sup>如其所谓:“民国成立以前,朝名屡变而国号虚悬,故所谓正史,大抵皆为君主一姓之史,而不见有吾民立国之史,即治史者,亦仅仅知治君史而不知君史以外别有国史,审是无今日之中华民国,则安有吾中华民国之史?”足见章崧修史的当代意识极强,他还说:“自民国完成,从此邦内治史诸家,不致蹀躞于君主国体专制政体之下,并得养成其社会观念、国家观念、世界观念,涣其史识而扩之广焉,矫其史才而又助之正焉。”<sup>[12]</sup>这是晚清“新史学”普遍具有的理念,反映出“国家”“国民”“群”“社会”等政治概念深刻影响了时人的历史研究,促使人们反思过去君主制度下所做学问的缺陷,章崧于此强调了政治变革对史学的积极影响,再次突出了构建新史学与新社会间的联系,发挥史学经世致用功能的必要性。<sup>[15]</sup>

而章崧以民众历史为主体书写国史的观点,除承袭梁启超之说外,还有自己思考深发之处,如其说到“古之说民者,多以民为非明”;“后之说民者,则以民为至明而非昧”。<sup>[12][14]</sup>故他写通史的主

要目的之一,就是探寻这种差异形成过程和原因,所以从“民数”“民级”“民德”“民风”四个角度探寻中国历史上民众户籍、人口数目的变迁,民众内部士农工商的分化,各个时期社会道德风尚的转移等。章崧指出:要使民众真心拥护革命,避免盲从革命或者盲信强族,必首先要加强民德民风的建设,这也是民成至明的关键。假不能如此,君主统治下“久挫之民风,一旦而造共和之制”,所需担忧的并非是民风难以自振,而是恣意无法约束。相较《新史学》以国民群体为历史重心,反对帝王将相家谱式的作史方法,章崧的《中华通史》已能从中华民族、政权实体的中华民国、国家的主体是民众等视角出发,安排通史编撰的架构,树立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新的时代提出了较为冷静之反思。

## (二)“国体”与“民族”演进的双重叙事线索

梁启超《新史学》批评传统史著太重视以朝廷君王为线索的政治史,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中国数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无一所闻”。<sup>[16]</sup>章崧也说:“历史上之系统者,多以人主一家之系为干,臣民万众之事为枝,陈规相袭,视为典常。”但章崧仍认为解释历史的统系,必由人主立纲,非敢蹈往史之例,而因“人主历世之系不昭,则一代传承兴替之征不著”,同时“君系之不可再行,往史所征,足为殷鉴”。<sup>[12][14]</sup>故章崧在《中华通史》导论部分详细将古代帝王谱系以图表形式呈现,并阐发朝代、年号、正朔的详细内涵,而正文内容重视政治史,对朝代更迭、帝王统系、政治事件都详加叙述。

章崧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新式通史可不满于传统正史,而历史记录留存的客观状况确是以王朝更迭为线索,完全脱离则无以把握古代历史的梗概。可以说,注重帝王统系,是清末到民初新式通史教科书编纂的重要特征,如夏曾佑书中的节名有“东周之列王”“秦始皇”“汉之诸帝”“后汉之诸帝”等。但诚如章崧的思考,为顺应新史学、新时代要求,需用新眼光来看待、组织原有王朝线索,这就是大体仿日式中国通史,采取新的历史分期形式。像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都将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为有别于他人,1908年章崧就把历史分为四个时期:“自邃古迄周末曰远古,自嬴秦迄唐末曰中代,自五季迄明末曰近代,自天命迄今曰今代。”<sup>[16]</sup>后为了凸显清朝孕育民国的作用,《中华通史》修订了原有分

期模式,如表1所示:

表1 《中华通史》章节目录

阶段(编题)	相距年数	具体包含的篇目	备注
上古史	民国纪元前四千六百零八年至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三年	文明孕育时代(黄帝前后) 政治发展时代(夏、商、周) 封建解纽时代(春秋战国)	公元前2696—前221
中古史	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及至纪元前一千零零六年	帝权初炽贵族助长时代(秦汉) 神州分裂外力内侵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 帝权再炽武人助长时代(隋唐)	公元前220—公元906
近古史	民国纪元前一千零零五年至纪元前二百六十八年	外力内侵神州复裂时代(五代宋附辽金蒙古) 蒙古入主国民转移时代(元明)	公元907—1644
近世并现代史	民国纪元前二百六十八年至纪元后二年	满洲人主民国胚胎时代(清)	公元1644—1913

由表1能看出《中华通史》的分期时段,受桑原骝藏《东洋史要》的影响极大,桑原把东洋历史(主要是中国)分四个时期:上古从史前到秦统一,为汉族充腴时代;中古从秦到唐亡,为汉族全盛时期;近古从五代到明末,为蒙古族全盛时期;近世史则是自清初至晚清,为欧人东渐时期。<sup>[17]</sup>四分法影响甚巨,如傅斯年1918年还说:“近年出版教科书,概以桑原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sup>[18]</sup>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崧等编定的通史教材,时期划分上虽与桑原骝藏几无二致,但理念表述已有相当的变革。《东洋史要》是从民族盛衰角度来划分时期,使中国缺乏一个连续的主体民族,只见各族群间强弱转化。桑原的划分割裂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完整性,在清末已经受到中国史家强烈质疑,如曾鲲化《中国历史》与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就变革东洋史写法,强调汉族在中国历史里的主体地位,“中国的衰微”实是汉族的衰微,后人多觉它们有“大汉族主义”倾向。<sup>[19]</sup>

民国以后,中国境内各民族都统摄在统一的中华民族认识之下,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也有异于往昔的认识,章崧以国体和民族关系两个标准划分时代。所谓“国体”,按1906年日本学者穗积八束的说法:国体是“主权存在之体制”,“因主权之所在而异”,可分为君主国体和民主国体;政体“由统治权行使之形式而分,可分为专制政体和立宪政体”;“国体不轻易变动,其变更意味着革命与反叛,而政体则因应时势而变迁”。<sup>[20]</sup>穗积八束提出的法学意义的政体和国体二元论,影响深远。受此影响,梁启超1907年作《政闻社宣言书》,称

“吾党主张立宪政体,同时主张君主国体”,已能将国体、政体明确区分。1910年,梁启超《宪政浅说》里亦指出:“国体之区别,以最高机关所在为标准”,“大率分为君主国体、贵族国体、民主国体之三种”。<sup>[21]</sup>由此观之,《中华通史》的分期,以先秦封建贵族到秦汉君权建立为一大过渡,又以秦汉到隋唐,君权(帝权)受门阀贵族等势力干扰过程为一大段落。最后宋到明清本为大一统王朝相继,君权不断巩固加强的时期,但章崧的当代史意识甚浓,遂把清朝单独辟出,作为民国(民主国体)的胚胎时代。而由民族关系看,《中华通史》主要扬弃了清末章崧《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等书的观点,将历史上的民族分为“本族”和“外族”,凡受中央政府管辖的,都视为“本族”;凡不接受中央政府统治的、且与政权有联系的共同体,都视为“外族”。按章崧阐发,历史上的“外族”常是打破大一统政权、建立割据势力的重要力量,所以魏晋南北朝和唐末五代都是重要的历史转折。<sup>[22]</sup>

概言之,在中华民国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国家建立的大背景下,章崧以“民国”和“中华”为著述立场,依循国体、民族关系两条线索对过往历史进行了分期。而分期的背后正如金兆梓的总结,是对因果关系的勾连,意在使先民全体活动和精神延续有完整的表现,故一面打破王朝兴衰的朝代观念,“一方面复依各事迹之因果,点出其起讫以为大段落,且力谋此事迹与彼事迹之联络”,而明进化发展的脉络,这也是《中华通史》所具有的晚清“新史学”的一般特征。<sup>[23]</sup>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章崧虽也批判秦始皇等帝王专制之暴虐,但多

着眼于寻找君主专制盛衰的原因,以作后人万世之鉴,继而促进民主共和的建设。另外,章崧笔下的中国民族主要指中央政府统治下的各族,它既非梁启超、杨度等立宪派人士倡导的文化民族,也不是章太炎、夏曾佑等所说的汉族。<sup>[24]</sup>这种认识,最终逸出了清末广义、狭义的民族主义之争,初步具有了将中华民族作为政治民族的色彩,乃是章崧一家之言。章崧还自知分期叙事不符合历史本身的非间断性,实为研究的无奈之举,可它不仅是对过去的审视,更是民国初建情状的体现,蕴含着章崧对未来构建统一多民族的现代国家的希冀。

### (三) 章节体的完善及文明史书写

章崧《中华通史》采用了“编一篇一章”的体例,编题、篇目用于历史分期,章节则服务政治史与文明史编写,从而别裁史料、创作新知,由此形成了几个特点。首先其章节体的运用较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更为纯熟,比如夏书叙述西晋历史只是简单划分为“魏晋之际上”和“魏晋之际下”,章书则分为“一统之迁延及八王之纷乱”与“五胡之炽盛及西晋之沦亡”,使人能快速把握这个时代转变的关节。其次中国传统史著偏重政治史,不大重视文明史,“新史学”则强调文明史塑造国民的意义,梁启超就强调:“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sup>[25]</sup>夏曾佑也说《中国古代史》非徒记政治,而正文却未很好落实。1905年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更指出:“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做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近于中国‘三通’体也。”<sup>[26]</sup>刘师培提倡、书写的文明史包括制度、文物、学术等广阔内容,而其后陈庆年和汪荣宝分别编的同名作《中国历史教科书》(1909)等,却基本未设置文明史内容。<sup>[27,28]</sup>直到《中华通史》1914年草就,文明史再次丰富。其书每篇前几章书政治大势,后几章阐发涵盖法制、文化两部分的文明史,而法制又包括建官、理财、制兵、用法,文化又包括学艺、美术、宗教、风俗,让读者大致了然每个阶段人才培养任用、农工商待遇、军事制度、法典编纂、艺术人文的状况。因文明史尚处探索阶段,书中内容倾向罗列,略显庞杂枝蔓,较难看出中国文化的演进。

最后需注意的是,《中华通史》编写发端同最后出版的定位,主要是服务于民国高等教育,其同中学或专门教育区别之处,就是它带有鲜明的研究性质。<sup>[29]</sup>章崧认为,大学中国史传授必须做到“相当的组织”和“相当的理解”。“相当的组织”指

对史料要有所取舍,基于史料撰书要注意“一个时代人民和国家的紧要关键”“一个朝代的通象”和“以往一切政象思想与现在社会的关联”。此“组织”兼有时代横向关联及历史纵向演进会通。而所谓“相当的理解”则指历史这门学问,不能专凭札记式、考据式、类书式与空论式的方法立说,需要吸纳一般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思路,从而能通盘考量复杂的历史成因。<sup>[30]</sup>

总的来看,《中华通史》基本如章崧门生所说:论体例,是书采通史之体制,“融会东邻本邦史论之精粹,去取别具眼光”,“诚国内一有系统有条理之史册也!”论内容,是书详略得当,非徒为帝王作家乘也。只是历史上王朝更迭,不容忽视,然其更重中华民族进化之史迹和社会发展之线路,故必于政治史后,列叙风俗文化。论纪年,“民国纪元记本国史事乃表国史之本色,较之他书之引用西历”为优。<sup>[31]</sup>而《中华通史》最值得称道处,乃其梳理民族关系、国体演进的脉络,强调文明史的书写,以求创编“国史”“民史”来取代“君史”,帮助时人树立现代民族国家与文明观念的旨趣。可以讲,有别于主干内容只至南北朝末期、略涉隋代疆域沿革的《中国古代史》,真正做到了章节设置、历史书写、思想旨趣等各方面的会通致用,亦弥补了夏曾佑等部分晚清学人编纂新式通史未尽全功的遗憾。

### 三、《中华通史》在五四运动后的延续和批评

晚清学人提出“新史学”概念并努力实现“新史学”理想,表现之一即为新式通史及教材的编写。以章崧《中华通史》为代表的新式中国通史,在五四运动之后仍具有相当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尤其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通史编写产生了较大的启发作用。但是,今人研究中对此给予的梳理和关注度尚显不足,如据桑兵等观察:似乎除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后名《中国古代史》)情况稍好外,大多只作学术史考察的对象,而不构成学术研究的基础,即使五四运动时期的学人,也很少以此阶段的“新史学”为前提。显然,此种认识未能恰当与公允地评价章崧为代表的新式中国通史曾作出的贡献。<sup>[32]</sup>

从近年整理出版的资料来看,作为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主要阵地的北京大学,1917到1926年间,中国通史相关课程讲授者,主要包括黄晦闻(黄节)、陈汉章、洪允祥、刘富槐、章崧等学人,其

内容设置则由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四个部分组成,而1926年末北大更拟聘章崧为教授揽近古史、近世史课程。<sup>[32]</sup>诚然,这些先生除了陈汉章,每人任教的时间皆短暂,常以两三年为限,但自最年长的陈汉章到最年轻的章崧,大体是晚清成长培养出来的带有传统士大夫色彩的学人。此反映了蔡元培任校长期间,在中国通史这个教育与研究领域,掌握学术话语权的是晚清那批学人。另外,这也体现出渐成主流的胡适派学人较缺少通史领域的实践,如顾颉刚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古史辨”运动的浪潮,1926年回国后的傅斯年更不主张讲通史,故他们学术成果多以专门研究及学术论战的面貌呈现。<sup>[33]</sup>

而时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日益严峻,学界希望通过中国通史等文化编著激扬民众的爱国热情,特别是1932年在王云五主持下,商务印书馆正式开始了“大学丛书”的出版计划。可略显尴尬的是,彼时已成为学界中坚,并且位列丛书编委会委员的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仍迟迟无法拿出能成系统和规模,较适应大学用的通史作品,所以最先出版的专著,反倒是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3)和章崧《中华通史》(1933)两部晚清学人撰述。<sup>[34]</sup>由此看出,章崧《中华通史》能自清末民初各种新式通史著作里脱颖而出,即使是“无奈之选”,还是得到新时期学者的基本认可。至于是书1933年初版到1935年三版,连同其台湾商务的出版历程,则侧面反映了它曾畅销社会及影响读者之广泛。<sup>①</sup>此后同为“大学丛书”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1934)、陈恭禄《中国近代史》(1935)与钱穆《国史大纲》(1940)才陆续出版,而北大通史主讲也由1920年代末的邓之诚,转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钱穆,中国通史的编纂开启了新的高峰期。<sup>[35]</sup>

今日回望,1930年代抗战时期,高校教科书还准备使用清末民初成形的通史,后起学人心理上恐是难以接受的,针对章崧的批评之声亦多。据张传玺回忆:1933年翦伯赞开始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史纲》,那时中国社会史和社会性质论战方炽,抗日烽火渐起,他奔波两头,闲暇不多。可据翦伯

赞观察,中国史学界固然有几种通史流传使用,如李泰棻《中国史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王桐龄的《中国史》,黄现璠、刘鏞的《中国通史纲要》,章崧《中华通史》,但观点理论皆属于资产阶级实验主义范畴,观念论、片面性、大汉族主义乃至不科学等问题突出。<sup>[36]</sup>其中黄现璠《中国通史纲要》与《中华通史》体例最为接近,《中国通史纲要》每章也是先述一代政事,然后明确这个时期制度、文化、民生状况及风俗,显然同受文明史影响。而直到1938年5月,翦伯赞还感慨:“由于历史哲学在中国历史科学的领域上没有展开其更高的发展,所以中国的历史家至今还不曾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即使分期史也还相当的贫乏,至于世界史,更没有提到研究的课程上。”<sup>[37]</sup>

相较翦伯赞站在宏观理论高度批评《中华通史》等“旧有”通史,缪凤林则更多自具体考证的客观性角度驳难章书,特别是对章崧给予黄帝确切纪年批评较甚,他指出:“黄帝纪元之年从何而来,是否真实凡此……本书中始终无此问题,也就无片语解释及此。”<sup>[38]</sup>故缪凤林细致研究,得出此说源自东汉卫宏、三国皇甫谧、宋邵雍《皇极经世书》推算,后被民国革命军文告所采,作为革命宣传、一般了解或能适用,但从纯学理讲有失严谨,可谓持平之论。关乎通史纪年,吕思勉曾说:“历史有年代,犹地理有经纬线。”旧日用君主年号纪年已不适用,而新制教科书多用民国纪元,即辛亥以前,均为逆计。“此法年代的先后,固亦可一见而知;唯逆计太多,亦总觉其不便。此编径用公元,以使用世界史互相对照。中国历史纪年,是否应径用公元,自亦成为一问题。”<sup>[39]</sup>该语没有明确指向,但观吕著通史之前诸家概略,主要还是《中华通史》大篇幅的以民国建元逆记,而纪年在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尤其儒家系统内是“正统”的重要象征,而受五四之后“科学实证”思潮影响,又赋予了学术客观性与世界历史普遍性的新内涵,章崧的纪年方式开始显得“不合时宜”。

于理论框架、纪年外,对《中华通史》体例,周谷城曾有过总结:“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后,中国旧式史书体裁似已发展到了尽头。直到夏曾佑

<sup>①</sup>现所见《中华通史》版本:《大学丛书·中华通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8月初版,1935年6月三版,此版本最早,上册包括上古史篇、中古史篇(秦汉到南北朝),下册包括中古史篇(隋唐)、近古史篇、近世篇;《大学丛书·中华通史》(共五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4月初版、1948年7月七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五版;《民国大学丛书·中华通史》(上中下册),东方出版社2014年初版。即使作为教科书,20世纪30年代初如此高密度重编再版也不多见,能反映其在民国图书市场的需求较大。

仿日之法编教科书,方有所谓新体,章嵒所编《中华通史》也都是这个体,且目前关于通史的编著几乎只用这一体。这确可称为新体,与以前任何体裁都不同。”<sup>[40]</sup>周谷城称《中华通史》体例为“坐标体”,即事件纵剖,依门类而分,如治乱兴衰、社会生活;时间横断,依朝代划分,如唐宋元明。纵横两种线索交织于书籍中,俨然坐标。周谷城认为排比史料、综述各朝典章制度,该体较进步适宜,若总体上看则最能破坏历史自身,使读者只“看见条理系统井然的史料”,忽视“活跃而完整的人类活动”。故其著述《中国通史》,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以“部族”“私有田制”“封建势力”“资本主义萌芽”为时代特征打破了王朝史叙述。

偏向文化保守主义的缪凤林、吕思勉,以及秉持唯物史观的翦伯赞、周谷城,对章嵒的批评多基于自己的作品。以“疑古”著称的顾颉刚则是泛论,如他1941年所写的《中国之史学》谈到:过去通史类书籍,多以日本人著作为蓝本,这是学界的奇耻大辱。顾颉刚倡导通史编著不能成为某个姓氏、阶级、种族或宗教的记载,应紧密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在具体步骤上要先重视旧资料整理,也可编人物传记、历史地理、通俗历史,然后融会贯通写整部通史。<sup>[41]</sup>顾颉刚通史编写的经验固然较浅,却不太影响1945年他《当代中国史学》里“盖棺定论”式的评说,他认为独撰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历史须待考证处又太多,故民国时期编写通史多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此处疑为周谷城著述,上海古籍版的句读有误),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sup>[42]</sup>顾颉刚还特别强调到“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建最多”,至此基本消解了晚清学人的话语能量,使民国后期到21世纪对通史作品的聚焦点发生了转移。

可以讲,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通史研究的风潮再兴,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唯物史观派、“疑古”派都开始重估清末民初新式中国通史的价值,这也成为了他们推进研究的学术基础。而各派间虽有分歧,可对晚清“新史学”采批判的态度却是基本一致,反而凸显了章嵒《中华通史》等曾有过的巨大影响。然恰如梁启超《新史学》痛批传统史学,难免有情绪化的表达,抗战时期学人对晚清

“新史学”思潮的批评,亦有值得辨析商榷之处。<sup>[43]</sup>从关于《中华通史》的史学批评里不难看出,抗战时期的学人以历史客观性或规律性的探求为治学旨归,往往能细致甄别史料,对通史叙述框架提出社会科学层面的要求,也能贴合时代发展革新纪年,密切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但就《中华通史》言,有夸大问题和忽略其思想创建之嫌。如翦伯赞所说“大汉族主义”,实章嵒开篇就于民国建立背景下强调“五族共和”,促进民族团结。周谷城所谓的“坐标体”,即认为章嵒把每个历史阶段的事实都简单划分为政治、法制与文化三个部分。因为在周谷城看来,历史发展的大势应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以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互动为线索来考察,而章嵒遵照国体、民族关系变迁的线索来进行历史分期,依然不脱政治史的范畴,无法反映历史演进的规律。

概言之,抗战时期的新通史编纂,将晚清“新史学”思潮影响下的“旧有”通史作为必须超越的对象,但这种以责难为主的声音,多少掩盖了一种学术延续性。如晚清民初的新式通史大多开始重视书写文明史(此处“文明史”,义近于包含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广义“文化史”),夏曾佑在《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中,对学术思想、军事、社会风俗等内容就略有涉及。而章嵒的《中华通史》正似前述,更是由导言到正文,强调文明史的内容,扩大了历史叙述的范围。此后,周谷城《中国通史》(1939)、张荫麟《中国史纲》(1941)、吕思勉《中国通史》(1944)等,都于通史里增加了文化史内容。再自具体章节设置看,以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同《中华通史》相较,缪书第十章“满族入主时代(清朝)”和第十一章“中华民族更生时代(民国)”,颇为类似《中华通史》的时代划分。由此可见,20世纪以来的通史编纂,其内容、方式都发生了转变,尤其是对文化史书写和章节体运用给予了更高关注。在这两点上,各阶段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区别明显,并反映了抗战时期新史学延续晚清“新史学”的一面,以及细节处仍有模仿《中华通史》的痕迹。<sup>[44]</sup>

整体说来,五四后的学人抱着不破不立的精神,几近全盘否定晚清“新史学”。而更多接续五四传统的现代学术,固然爬梳新史学学术脉络时能追溯到晚清,但是用来评判新史学的标准,则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史学风潮影响极大。像金毓黻1944年就曾总结:“可知近顷学者治史之术,咸富

于疑古之精神,而范以科学之律令,又以考古、人类诸学,从事地下发掘,以求解决古史上一切问题,因以改造旧史,别创新史,盖蒙远西学术输入之影响,以冲破固有之藩篱,利用考见之史料,而为吾国史界别辟一新纪元者也。”<sup>[45]</sup>这也大概初步解释了,为何单独研究清末民初的新式中国通史编纂,今人多能给予较为正面的评判,而一旦用新史学立场加以审视(实以“科学实证”主义为核心),否定之声渐多的现象。<sup>[46]</sup>

既然晚清“新史学”在抗战时期学人追述中,大体以负面的形象出现,那这种不满是否只限于通史编撰的内容和方法?事实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后来学人眼里,晚清各家所依凭的西学知识较为浅薄,而学术求客观科学又逐渐胜于政治功用,使对外国了解大为扩张的五四新学人,更具世界历史普遍性的眼光,如周谷城强调社会形态理论、吕思勉倡导公元纪年等,而非像章嵒那样侧重在中国历史自身的沿革内探讨问题。<sup>[47]</sup>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后,学院史学的学科训练里,断代史、专门史化的通史成为课程主干,以北京大学为例,只有钱穆还开设中国上古史,故钱穆发出“通史不通”的感慨,握有话语权威的顾颉刚等人尚且对同时代作品颇有微词,更遑论前辈之著述。不过各家抨击各自前面新史学,树立自己新的史学标准时,难免“击水断流”,淡化了富有张力的晚清“新史学”的影响。

### 结 语

由学术的传播影响观察,夏曾佑反成晚清“新史学”的幸运儿和特例。胡适就曾说:读过该书后,“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想代他整理一遍,作一新版本”(《胡适日记》1930年8月14日)。<sup>[48]</sup>大致来看,能否获得五四健将的直接激赏,成为一部通史作品后世影响大小的关键,直到1944年此书还能在成都出版,足见受重视的程度。<sup>[49]</sup>亦无怪乎齐思和评价其为晚清以来“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成为少数享有殊荣者。<sup>[50]</sup>而更多类似章嵒的清末民初学人,如王汎森所说成了历史的“低音”,可又不似王国维那样渐成“显学”,其微弱甚至飘忽于湮没的边缘。<sup>[51]</sup>然章嵒及其著述在历史阶段中并不真的是“低音”,而最终成为“低音”,主要因为新史学话语的变迁。平心而论,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和章嵒《中华通史》是各具优长的。例如《中国古代史》是较早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来

分析中国历史进程和因果关系的著述,其中还区分了传说、信史的差异,批判了君主专制的流弊,加之章节体的运用,对“新史学”思想的实践不无开创之功。而《中华通史》对国体、政体、民族关系演进的梳理,以及强调文明史书写,在中华民国成立的背景下,有助于树立时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推动社会民主共和的建设。另《中华通史》对20世纪30年代通史编撰的新潮流颇具影响,诸家吸纳了章嵒部分见地,却只批评其疏漏,而少言其创建,显然也非持平之论。故至于今日再研究近代新式通史变迁,理应明辨前学观点内的偏见或遮蔽,不能一味推崇夏曾佑,淡忘了章嵒等曾作过的巨大贡献。因此,晚清“新史学”思潮在民国学界的延续与影响,确实有重新考察及反思的必要,力求恢复更加客观全面的学术图景。

### 参考文献:

- [1]桑兵.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及其流变[J].史学月刊,2007(11):5-28.
- [2]曹旭,主编.中国百年师范教育图志[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77-83.
- [3]章嵒.校友会杂志发刊词[J].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1916(1):13-14.
- [4]学术界消息:史学家章嵒逝世[J].编辑者,1931(2):19.
- [5]黄现璠.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J].师大月刊,1933(5):70.
- [6]吴景贤.近代中国历史研究法与通史之检视[J].教与学,1935(4):13.
- [7]张元济.诗文[M]/张元济全集·第5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4.
-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9:67.
- [10]章太炎.中华民国解[J].民报,1907(15):2.
- [11]郭廷以.中国近代史纲[M].3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12]章嵒.中华通史(上)[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 [1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317.
- [14]王尔敏.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81.
- [15]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5.
- [16]章嵒,编著.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M].上海:文明书局,1908:16.
- [17]桑原鹭藏.东洋史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8:1.

- [18]傅斯年.历史分期之研究[M]/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30.
- [19]横阳翼天氏(曾鲲化),编辑.普通学教科书第一编·中国历史(上)[M].东京:东新译社,1903:1.
- [20]穗积八束.论宪法及内阁制[J].法政杂志(东京),1906(1):198.
- [21]梁启超.宪政浅说[J].国风报,1910(1).
- [22]刘超.“增其新而不废旧”:转型时期的历史书写——以章崧《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J].历史教学问题,2017(5):131-137.
- [23]金兆梓.新中学教科书·初级本国历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3:2.
- [24]杨度.金铁主义说[J].中国新报,1907(1):10-19.
- [2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1·饮冰室文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96.
- [26]刘师培.中国历史教科书[M].扬州:广陵书社,2013:2.
- [27]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
- [28]陈庆年,编.中国历史教科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
- [29]程文标.新传媒与近代史学的转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82.
- [30]章崧.大学的本国史应该怎样教授[J].北京高师教育丛刊,1923(3):1-3.
- [31]章崧.中华通史(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368.
- [32]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40.
- [33]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51[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172.
- [34]黄静.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J].史学史研究,2004(3):1-7.
- [35]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6.
- [36]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4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278.
- [37]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M].上海:新知书店,1938:序3.
- [38]缪凤林.大学丛书本国史两种[J].图书评论,1934(2):16.
- [39]吕思勉.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例言5.
- [40]周谷城.中国通史[M].上海:开明书店,1939:17.
- [41]顾颉刚.顾颉刚全集34·宝树园文存卷2[M].北京:中华书局,2010:294-295.
- [42]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上海:胜利出版社,1947:85.
- [43]刘开军.晚清史学批评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288-297.
- [44]缪凤林.部定大学用书·中国通史要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目录1-3.
- [45]金毓黻.部定大学用书·中国史学史[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325.
- [46]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01-502.
- [47]桑兵.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政治、社会与文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5.
- [4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1928—1930)[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758.
- [49]夏曾佑.中国古代史[M].成都:商务印书馆,1944:1.
- [50]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J].燕京社会科学,1949(2):25.
- [51]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

责任编辑 刘正花